

和谐社会的 实践基础研究

夏建国 著

On the Practical Basis of
Harmonious Society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和谐社会的 实践基础研究

夏建国 著

On the Practical Basis of
Harmonious Society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谐社会的实践基础研究/夏建国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307-11779-2

I. 和… II. 夏… III. 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中国 IV. 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7715 号



责任编辑:唐伟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马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湖北睿智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5.75 字数: 225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1779-2 定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本书由武汉市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实践规范与社会和谐内在关联性研究”(08092)、武汉大学自主科研基金课题(人文社会科学类)“社会和谐的实践基础研究”(09113)资助出版，是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现时代”研究方向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

(代序)

陶德麟

中国梦正在激励着中国各族人民开启史无前例的伟大长征。

中国梦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之梦。这个梦不是虚幻不实的空想，不在遥不可及的彼岸，而是必定能够实现的理想。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我们找到了实现这一理想的正确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概括的，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经过中华民族从 5000 多年前到近 30 多年来的探索和总结中一步一步地走出来的。这里的决定性的事件，就是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救国救民的真理。

鸦片战争以来，伟大的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残暴侵略下陷入了血泪斑斑的苦难深渊，救亡图存的任务迫在眉睫。先进的中国人历尽千辛万苦从西方寻来的各种资产阶级理论和方案，到了中国都一一破产。在长夜漫漫的困境中，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路在何方”的难题才有了正确的答案，中国的命运才发生了根本改变。经过 28 年的奋斗，我们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经过 60 多年的奋斗，中国才取得了今天这样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了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事实。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这么“灵验”？就因为它是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也产生于西方，但它不是地域性的理论而是世界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它批判地吸取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优秀成果而又突破了它们的局限性，形成了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本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它的根本精髓，就是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的实践观。这一实践观揭示的道理主要是：(1)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是以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为根本的实践活动。社会发展规律的“秘密”只能到实践中去探求，而不应当与此相反。(2)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都是在实践中发生的，解决这些问题也只能通过“变革的实践”，而不能停留于“解释世界”。(3)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只有实践才能检验，离开实践的争论是“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历史理论浩如烟海，体系如林，有些理论也包含着局部的真理甚至颇为深刻的真理，但究竟如何理解社会，如何创造历史，如何看待人类的前景，仍然是“斯芬克斯之谜”，没有人能揭穿“谜底”，总的来说仍然是一笔糊涂账。马克思的理论一出，就提供了一把开启“暗箱”的钥匙，使人们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当然，不同的人们由于种种原因，并非都能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但这是另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至今仍然占据着人类思维的制高点，却是客观事实。

建立在科学实践观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普遍规律的反映，它不可能直接对各个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千差万别的特殊情况和特殊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而只能提供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告诫人们，他们的理论只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包医百病的处方，不问具体情况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词句，恰恰违背了马克思主义，首先是违背了它的实践观。中国有中国的特殊情况和特殊问题。要解决中国的问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行，不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也不行。中国道路是中国人自己“走”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际（包括中国的历史传统和中国所

处的时代条件及国际环境)不断结合的过程，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践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过程。要把中国道路走好，就得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在各项工作巾把它落到实处。

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要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历史经验，吃透精神，掌握实质，武装头脑，提高思维水平，反对没有理论指导的目光短浅的经验主义。第二，要下硬功夫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获取第一手材料，在全面准确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概括，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审时度势，提出有全局眼光和长远眼光而又切实可行的处理方案并付诸实践，防止形式主义和误国空谈。第三，要发扬创新精神，勇于根据日新月异地发展着的实践提出新举措，开拓新局面，防止保守僵化。第四，要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引领下切实整顿党风、学风和文风，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党八股和洋八股。第五，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理，不唯书，不唯上，把一切判断和措施都交给人民群众的实践去检验，正确的就坚持，错误的就改正。

只要我们始终不懈地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在中国精神的鼓舞下战胜征途上的任何艰难险阻，稳步地达到我们的目的，使中国梦梦想成真。

(原载《光明日报》2013年4月16日)

目 录

导论 和谐社会：中国道路的逻辑必然	1
一、中国道路的客观逻辑	1
二、中国道路的历史逻辑	10
三、中国道路的实践逻辑	15
四、中国道路的现实逻辑	20
五、重视对于和谐社会实践基础的研究	31
 第一章 和谐社会及其建构条件	37
一、“五位一体”的和谐社会	37
二、和谐社会与社会和谐	42
三、和谐社会的建构条件	44
 第二章 当代中国社会的实践形式	75
一、实在实践	75
二、虚拟实践	82
三、模拟实践	90
四、实践形式的新特点	92
 第三章 当代中国社会的实践理念	99
一、实践理念及其生成	99
二、当代中国社会的实践理念及其特点	108

第四章 和谐社会建构进程中的阻滞观念及其消解	126
一、经济阻滞观念	126
二、政治阻滞观念	139
三、文化阻滞观念	150
四、生态阻滞观念	153
五、阻滞观念的消解	155
第五章 和谐理念及其文化形态	164
一、和谐理念	164
二、和谐文化：和谐理念的文化形态	175
第六章 和谐实践的实现	209
一、倡导和谐理念	209
二、弘扬和谐文化	212
三、培育和谐实践主体	217
四、规范社会实践活动	236
结语 和谐中国 和谐世界	240
后记	244

导论 和谐社会：中国道路的逻辑必然

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与规律实现的自觉性决定了各民族社会演绎道路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社会演进呈整体推进、跳跃波动、低层转型等特性。这些特性在近代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决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道路。中国社会的独特个性及时代任务，决定了中国革命道路、建设道路和改革道路的特殊性。当下中国建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中国道路的逻辑必然和现实展现。和谐社会重在实践，贵在建设。因此，必须重视和谐社会的实践基础研究。

一、中国道路的客观逻辑

中国道路是指由社会发展普遍规律支配和制约着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特殊道路。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在近代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探讨中国革命道路、建设道路和改革道路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对于我们今天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必然性和科学性是十分必要、大有裨益的，也是我们开展“和谐社会的实践基础”研究的逻辑起点。

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特殊组成部分。它与自然界一样，有其固有的客观规律及自然发展过程。然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要通过人类的自觉活动才能得以实现。自然规律的自发性与社会规律实现的自觉性，决定了社会发展道路的一般性和特殊性。

一般而言，自然现象从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是线性与顺时性的，而社会发展则会出现线性与跳跃性、顺时性与逆时性交错纷呈的情形。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由社会的客观

物质条件决定的，说到底这是个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过程。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本质上是人与人社会物质利益关系调节方式的变更。一定社会条件下生活实践着的人们创造特定的物质基础，同时又为进化到更高一级社会形态提供条件。由于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资料满足人们需要的现实程度决定了社会的占有方式和分配方式，因而一定类型的社会形态所容纳的社会物质财富一定且有限。但是，由于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矛盾冲突和不断解决，加之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永恒需要以及创造意识的驱动，推动着社会生产力永不停息地向前发展，使得一定类型的社会形态创造着自己也容纳不下的物质生活资料和社会财富，使得重新调整占有和分配方式成为必要，推动着社会向更高一级形态转化。社会“自己走着自己的路”，自我否定、自我发展、自我关联，形成了社会形态的转换与衔接，构成了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序列，呈现出“五种形态”依次更替的自然历史过程。人们的自觉活动在社会客观规律的实现过程中发挥着“合力”推进、能动地促进和转化等作用。社会发展虽由物质基础驱动，但物质基础的创立则取决于人与自然矛盾解决的性质和程度。在解决、协调人与自然矛盾的过程中，人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显示得格外重要。

一定社会中的人们生活在既定的物质条件之下，在自然允许的范围内，在自我对必然认识的前提下，从事着改造自然的活动。在人与自然关系层面上，自然袒露着它的宝藏，而人则在实践中不断地获得更多更符合自然的认识和知识，从而更好地作用于自然，使社会所获得并占有的物质财富不断聚集和积累，使人们所拥有的社会财富不断增加，使社会形态在自然进化过程中更加远离自然，又更加贴近自然，最终完成对必然的认识，达到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使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一步步靠近。

然而，正因为人类自觉活动在社会客观规律实现过程中的独特能动作用，形成了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建构着社会上层建筑殿堂。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使得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调控在一定的秩序和范围之内，从而维护着社会统治者的物质利益，客观上也维持着社会的整体发展。由于社会上层建筑对社会经济基

础的能动反作用，使得社会规律的实现具有独特的性质和特征。

第一，人与自然矛盾的消解取决于社会上层建筑的性质。一定社会上层建筑的性质制约和决定着人们自觉活动的功能作用及社会价值。虽说自然的先在规定性、客观制约性限制着人们的认知和实践活动，但人们的自觉能动性形成了人对自然的主动创造性。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程度，取决于自然允许的程度，取决于一定社会人们对自然的认识程度，更取决于社会上层建筑的历史作用。社会上层建筑性质不同，历史作用不同，决定了社会对自然的利用价值的差异，自然价值对社会发展起着不同程度的历史作用。

第二，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表现为人与人社会矛盾的解决。人与自然是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在人们从自然中的索取不能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消费需要时，人对自然的占有便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决定了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和消费关系。由于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不同，社会因而划分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冲突与不断协调解决，导致社会形态的转型。在社会形态转型之际，社会的矛盾冲突便主要表现为先进的生产力代表与落后的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矛盾冲突在自然进化和进步选择的原则下，以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建立适应社会生产力需要的更高一级社会形态而告终。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便是先进的生产力代表建立自己社会形态的社会集团的更替过程，即不断在自然力量的推进下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进化过程。

第三，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具有整体推进性。就整个人类社会而言，由于人类社会的自然历史客观性制约，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不可能超越必要的历史阶段而跳跃运行，当一种社会形态还未发展到需要过渡到下一社会形态即社会上层建筑还未失去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适应性、促进性之时，更高一级社会形态不可能形成和产生。这种整体推进性对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社会转型有整体支配和制约作用，因而人们不可能完成时代未提出的任务，不可能建立自然未允许创建的社会。在条件还不成熟时，即使时代已经提出课题，并由人的自觉活动实现了社会形态的更替，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巴黎公社的英雄壮举及伟大实践，被自由资本主义的前进车轮

所摧残就是如此。而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便开启了世界资本主义形态向更高形态转化的历程。

第四，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跳跃波动性。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也经常走着奇怪的道路。在整体线性顺时演进的同时交错着个别部分的跳跃式、波动式、跨时性甚至逆时性的跃迁。由于各地域不同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人类社会的整体演进具有不同步性。对于某一特定地域而言，外部因素的渗入，往往会打乱这一区域的整体正常运行时序，使之呈跳跃波动态势。若外来因素是时代的“社会旗帜”，代表着人类社会整体进化的发展阶段，那么特定范围内的部分整体便前跃；若外部因素虽然在社会形态上落后于被侵入对象，但在力量上强大而后者极度腐败、不堪一击，那么这种外力会与较先进的制度融合生成一个自我“前跃”的新形态；若外来因素是暂时强大的落后形态，那么被侵蚀的部分则暂时后退，使社会呈逆时运转。跳跃波动是整体允许范围内的部分性，而部分跳跃则更加证实了整体推进性。

第五，社会形态的转化呈“低层转型”性。自然演化过程是“高层递进序列”或“高层转化推进”。当上一形态发展较为充分且完备之时，它所孕育的下一形态才得以生成。自然现象是这样，社会整体序列也是如此。正如马克思所言：“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①社会的整体推进是高层转型。但是，具体社会形态的转型却不是这样。它们的转换过程则呈现出“低级转化序列”或“低层演进性”。如：封建社会最先产生于奴隶制不发育的中国社会母体，资本主义社会率先在封建制薄弱的欧洲生成，而社会主义则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东方社会最先诞生。东、西方虽然是两个互异互补性系列的转化类型，但都揭示出一个共同的规律即“低层转型”性。诚然，“低层转型”是以“高层递进”为基础的，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

社会形态整体推进过程中出现的“转型”特性。这种替代转型规律形成的原因主要是一定社会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依此而论，人们的自觉活动对客观规律的实现起着一定的限制作用。人与人的社会精神关系以社会“上层建筑”的形式出现。上层建筑实则是人们精神关系的物化，是社会不同物质利益集团的维系秩序，是由社会物质利益关系决定并为一定社会利益集团服务的。它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独立性，对社会物质关系有制约作用。当它发展得充分而完备时，对下一社会形态有抑制和扼杀作用，使得它所维系的社会母体内部孕育着的新社会因子等否定因素在萎缩状态下生长。反之，当它建构得不甚完备之时，新社会因子则能在较为宽松的氛围中快速生成和生长，从而较容易突破母体外壳，完成社会形态的转型和重构，使社会形态在顺时沿袭中呈跳跃式发展的态势，在一般发展原则中呈特殊的多样性，形成社会不同于自然的“特色道路”，也决定了不同社会形态、同一形态不同地域或不同发展阶段的“特色道路”。这便要求不同具体形态中的人们走自己的路，根据本地实际选择发展道路。

社会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在近代中国体现得较为典型。中国社会在资本主义有所发展而发展不足的情况下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正是社会发展规律制约的结果，由此也决定了中国的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改革开放道路必然是带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道路”。

厚重的历史感生成明晰的未来感。为了更好地了解现在，更好地往前走，就必须知晓中国的历史特性，知道中国是如何走过来的。也就是说，为了更好地揭示“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历史。

在以山脉、沙漠、海洋为自然屏障的中华大地上，勤劳聪颖的中国人民曾经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走在世界整体推进的前列，给人类社会以重大影响。它按着社会既定的客观规律前行，显示出人类社会普遍规律对各国、各民族发展道路的支撑功能和制约效应。

由于事物本身的辩证性质，这种封闭式疆域挤压而生成茂盛生

长的封建专制制度。广袤的大地造成了高度分散的邦域个体，形成了中国社会既高度集中又严重分散的建构模式和强劲的民族向心力、凝聚力与离心倾向并存的社会心理。社会维系的支柱主要是独尊的儒术、人格化的偶像崇拜、极权式权威及强大的专政工具。然而，一旦失去了社会权力维系的权威，社会就会陷入无序流变，专政工具也失去了统一的目标而分崩离析，成了各个独立的个体或部分权力的工具，加剧了社会的混乱。一旦重新建立起统一的偶像及人格权威，社会又重新显示出昔日强大的凝聚力而形成整体。中国封建社会就这样在治乱、合分的环流漩涡中缓慢前行。这样的社会运行机制形成了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封建体制发育得异常充分而完备，使得新社会因子难以正常发育；也使得社会文明在剧烈的震动中绵亘不断，中华民族生息繁衍，封建社会延续长达 2000 多年。

中国地大物博，在与外界交往甚少的年代，形成了唯我独尊、自我中心的自大心理和满足意识，儒学的人伦关系之网也维护着家族中心、社会权威的至上地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农业为支柱，农业社会那“向后看”的思维方式形成了社会的恋旧情结。人们总是到往日的富贵、历史的乐园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妨碍着新的社会因素的萌芽生长，使得任何变革都步履维艰、命途多舛。尽管过分浓郁的封建专制窒息、扼杀着新的社会因素，尽管巨大的社会财富成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历史包袱，尽管古代文明的成就成了人们容纳、接受、产生现代社会因子的制约因素，然而，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内在驱动力促使资本主义因素破壳而出，扭曲生长。明朝以降的中国封建社会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它恰似行将就木的历史巨人，已无力阻止时代新生儿的降世。中国社会已出现了现代文明的曙光。

在中国社会即将按部就班地步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完成社会形态的转换之际，它的发展程序被内部强力和西方列强所打乱。

清朝相对于明朝在社会形态上虽然落后，但在力量上则较为强大。虚弱的明朝被彪悍的马背民族所击垮。社会虽然保持了封建专制外形，但其内腹则急剧退化。从原始部落奔入近代社会的游牧民族，对以农耕文明为主要形态的中华灿烂文化知之不多，对其社会

功用也不甚明了，因而对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识不足。因此，它不仅不能将其先进性发扬光大，反而进行限制和销毁，它接受的只能是社会的专政工具和神权思想。它迷信强力，建立了一个类似于欧洲中世纪那样的神权和暴力的联合统治机器；它及时行乐，腐化堕落，使中国封建社会在专制和腐朽层次上复归，更加扼制了社会的进步，使中国社会更加虚弱，因而无力抗御外敌的掠夺和入侵。

自然屏障在西方先进生产力所铸造的坚船利炮面前不足以成为保持中国世情纯洁性、发展自然性的保障。中国社会在自然发育过程中被西方先行者强行并入其发展序列，成为它们发展资本主义的附庸，中断了中国资本主义“自然生长”之路，中国社会被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充当着西方列强廉价劳动力、廉价原材料供应地、商品倾销地和资本投资场所。

西方列强的侵入，一方面堵塞了中国自行发展资本主义的既定道路，另一方面又使得中国资本主义因素更加扭曲地畸形生长，使中国社会有可能跳过资本主义发展形态而实现社会主义。类似的情形，马克思在1853年就已论及。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等文中，马克思在谴责殖民统治和掠夺对印度等东方国家造成灾难的同时，指出正是这种现代工业文明“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① 它起着“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和“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的破坏和建设的双重作用。^② 具体说来，这种历史作用主要是：实现了复兴社会的首要前提——政治统一，并用现代联络手段将其巩固下来；入侵者训练出殖民地赢得独立的必需条件——军队，这是殖民地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并保卫自己免遭侵犯的可靠保证；创办改建社会的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自由报刊，形成舆论阵地，完成宣传组织任务；培养具有现代管理知识和欧式科学的社会管理阶层，完成社会管理的机构设置；现代化交通工具将殖民地与世界联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6页。

结成一体，消除了孤立状态，促进了社会进步。除此之外，更重要的作用是：

第一，它摧毁了封建社会存在的基础——自然经济，解放了人的“历史首创精神”。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它闭关自守、细小刻板，“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① 自然经济的本质是自给自足，使人形成了狭隘的自满意识。它形成了人身依附关系，限制了劳动者的创造热情和主动精神。而“不列颠的蒸汽机和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彻底摧毁了农业和制造业的结合”。^②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代科学等因素摧毁了男耕女织式的田园风味的自然经济，使封建制存在的物质基础趋于瓦解和消失，为新社会的创立清除了基础障碍。新的生产方式的建立，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否定了人身依附关系和特权等级思想，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然而，随着封建制的瓦解，社会建立的不必然是资本主义制度，而只是使资本主义因素有所发展和增加。殖民地人民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在比较遥远的未来，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得到重建”。^③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之时，人民才会真正品尝到胜利的甜美酒浆，^④ 迎来独立和富强。

第二，它创建了无产阶级大军。西方列强要掠夺殖民地的物质财富，必须将铁路修到那里，要将机器、设备、技术带进矿场和工厂。这样就将先进的生产力移植到了贫瘠的封建土壤上，使得中国社会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成分畸形、快速生长，产生出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创建者。尽管近代中国的工业发展带有殖民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2~68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0页。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1页。